

学到底

——重温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 郭 祥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具体回答了为什么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如何推动学习和如何巩固学习等五个问题，是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

为什么学习

一是要领导革命，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早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要领导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没有学问是不行的。毛泽东突出强调，学习马列主义这门大学问，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

二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毛泽东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他形象地说：我们的好多干部本领只有一点点，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不进货，只有关门大吉。“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

三是要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政党、强党。“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毛泽东指出：“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培养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以上三点，目标是一致的：建设强大政党，承担时代使命。党员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而且是关乎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

学习什么

1938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学习的三大任务：一是要系统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我们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遗产给以批判的总结；三是要研究抗日战争（民族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三大任务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形式”“现实问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再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固然很难，但共产党员必须读通其中的道理。同时对党的建设、联共党史等，“要长期地学下去”，把这些学问搞好。而对党的政策看一眼就丢掉亦是不对的，“应该把党的政策经常地研究”。一切皆在变化之中，“不研究党的政策，单学习那些理论是不够的，会跟实际脱节的”。一句话，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实践，要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怎样学习

毛泽东的方法是“挤”和“钻”。全面抗战时期，在延安的干部既要生产，又要作战，还要完成其他日常工作。“没有功夫”成为许多干部不学习的理由。针对这一点，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

党员的真精神。怎么解决呢？毛泽东指出，“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

延安时期，部分党员干部限于自己的识字水平，以“看不懂”为借口抵触学习。对此，毛泽东给出的方法是“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毛泽东指出，对我们不懂的东西，不能只取守势，不取攻势，“如果我们以‘仇人’的态度不讲感情地攻它，一定是无攻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堡垒攻下来”，“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敲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

如何推动学习

毛泽东提到，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这个大学是天下第一，是“无期大学”，是延安的独创，任何人都可以进。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乃至军队都应该设立类似的教育机构，建立学习制度，使党员干部有组织地学习。

但有组织的学习不能伤害党员干部学习的热情。“学习运动的基础，是我们同志们自觉的热情”。学习运动的开展要有组织的进行，亦必须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主动性，要给党员干部自由看书的时间。“我们的方法是采取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互相配合起来”，既要约束干部完成“规定动作”，又极力提倡干部做好“自选动

作”。不久，毛泽东将其概括为“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实际一致”，并要求“勤学者奖、怠惰者罚”。

如何巩固学习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都要“学到底”。

“学到底”，在毛泽东看来，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活到老学到老、长期学。毛泽东勉励年长的同志学习时说，“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二是学习的内容要广泛，理论问题、时事问题、政策问题都要学习，“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如果在世界上有许多自己不懂的东西，那共产党人就不算最好的革命者。三是学习要刻苦，“把学习的一切困难都克服下去”。毛泽东指出：“从什么年月学好了，或者什么天才，都是骗人的。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采取“学到底”方针，一定能克服自满的坏现象。

学习才能上进。“我们党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毛泽东80多年前提出的“学到底”方针，是一条学习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既可指引我们党的建设，又能指导我们个人的学习。

重读经典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出席联合国日内瓦总部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在精辟阐述共同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时，首次提出“我们应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等理念。这些理念，秉持中华文明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和国际红十字會创始人杜楠创会的初衷使命，以敬佑生命、尊重和保护人权为中心，以甘于奉献、服务社会为行动准则，避免了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超越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的时空，汇聚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已被载入联合国多项决议，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缪慈潮）

弘扬博爱精神

【讲话原文】

1862年，亨利·杜楠先生在《沙斐利洛的回忆》中追问：能否成立人道主义组织？能否制定人道主义公约？“杜楠之问”很快有了答案，次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运而生，经过150多年发展，红十字成为一种精神、一面旗帜。面对频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应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为身陷困境的无辜百姓送去关爱，送去希望；应该秉承中立、公正、独立的基本原则，避免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坚持人道主义援助非军事化。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

【出处】

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

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德义，而民兴行（意思是：从前的贤明君主发现教育可以感化民众，所以先倡导博爱，民众因此没有遗弃双亲的；向民众讲述道德、礼义，民众于是起而遵行）。

——《春秋战国》《孝经·三才》

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意思是：君主的治国理念，在于顺其自然而不随便干预，在于致力惠及更多的民众，在于着力任用有德才的贤人）。

——【西汉】刘向《说苑·君道》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意思是：广爱众人就叫做“仁”，遵循“仁”而行为合宜就叫做“义”，德行“仁义”而前行就叫做“道”，无需借助外力而达到自我完善就叫做“德”。）

——【唐】韩愈《原道》

【解读】

以上三段有关“博爱”的论述表明：“博爱”指的是对人类广泛地爱，惠及众人。其含义：首先是一种执政理念，意在使国家的制度、法令、政策、措施的受益面尽可能最大化，让更多民众得到好处；再就是与众人亲密相处、友善相待、守望相助的一种社会伦理、个人品格与人文情怀。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初题写的“博爱”二字，就表达了他一生“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大爱精神。

弘扬博爱精神，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高度，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携手共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费孝通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早期的著作《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对社会学中国化影响深远。改革开放后，他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起到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行行重行行——中国城乡及区域发展调查》（2014年版）是费孝通晚年集大成之作，其中的一系列著名论文，形成了他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小城镇理论。书中蕴含的治学追求、治学作风和治学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治学追求：“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费孝通做学问始终没有离开农村和农民，如其所言，“推动我一生学术工作的主要动力，就是希望为农民富足、农村兴旺、中国强盛做点实事”。他80岁生日时，有人问他一生究竟要做点什么事？他回答说：“志在富民。”“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这首小诗是费孝通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概括总结。费孝通富民思想来自于青年时代的农村调查。1936年夏，费孝通在广西调查不幸受伤后，来到江苏吴江开弦弓村休养。在养伤期间，他被现代缫丝工业进入

治学之道

农村的情形所吸引，对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进行了详细调查，促成了成名之作《江村经济》的完成。江村调查的亲眼所见让费孝通深深体会到农村的贫困和苦难，产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从此，他孜孜不倦地实践着“志在富民”的诺言。

《行行重行行》收录了费孝通1981—1996年间开展乡镇发展实地调查和思考的研究成果，重点探求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问题，为“富民”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城市化的大幕徐徐展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1981年至1983年他多次重访家乡江村，欣喜地捕捉到小城镇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伟大意义。《行行重行行》开篇从《小城镇·大问题》破题，通过论述小城镇的兴衰，指出发展工农结合的小城镇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紧接着第二篇《小城镇·再探索》，他引入“模式”的概念，率

《行行重行行》中的治学之道

□ 满新英

先提出由乡镇企业兴起的“苏南模式”。基于各地不同的发展经验，他又陆续提出“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小城镇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区域发展”思想，先后提出“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攀西开发区”“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区”“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等战略构想，直接推动了边区开发的进程。

治学作风：“从实求知，经世致用”

费孝通治学，一贯作风是“从实求知”，提倡学术研究要“经世致用”。“从实求知”，即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进行学理性研究，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问题方案。他批判“‘为研究而研究’的观点，认为‘‘为研究而研究’是一辈‘寄生性’学者的护身符。‘学术尊严’！

我是不懂的，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费孝通始终强调重调查、重实证、重实践的务实作风，把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用事实来解释社会问题。为了更好的了解中国之“实”，1984年他的研究范围跨出江苏，分两路穿插进行考察。一路走沿海，从浙江、福建、广东、香港，进而到达广西；一路沿边区，从内蒙古，西行宁夏、甘肃、青海。此外，其间还去了中部的河南、湖南和陕西，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地区。走遍了除中国台湾和西藏外的所有区域，开启了“行行重行行”的新长征。这种务实的作风让他“走一趟，写一篇”，每到一处，便写一篇文章。积成50多万字的著作《行行重行行》，汇成了一部中国农村变革的全景画卷。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的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西部地区开发以及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等多项建议，先后被政府有关部门采纳。为我们树立了“学

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全面小康意味着什么？《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2期刊策划邀请专家学者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如何深入理解全面小康与我们所处阶段的特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辛鸣教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方位》一文中认为，实现小康是中国社会2000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把实现小康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努力推进。千年梦想、百年目标，在2020年变为现实，这将是中國历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一个令人激动的重大时刻。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理论清醒、政策稳健和实践定力，那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没有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在發展上做文章，在“全面”上下功夫，为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从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面临哪些挑战？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李实教授在《从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的着力点》一文中指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将逐步走向富裕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从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还需要从多个方面着力。首先，我国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在未来30年得到根本解决；其次，需要选择和设计出可行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要建立起共同富裕的制度和机制，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与科技创新体制、建立收入分配制度和再分配的政策体系，构建公平与效率兼容的收入分配制度；再次，在未来30年有针对性地设计和出台一些改革措施，通过政策手段来逐步消除机会不平等；最后，迫切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全面小康目标实现后，我国脱贫攻坚的任务如何转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贫困治理进入新阶段》一文中认为，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我国贫困治理取得巨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面小康建成后，贫困问题仍将是发展的主要矛盾，但是贫困的特点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变化，以绝对贫困呈现的贫困特点将更多地以相对和多维度的特点来呈现。这意味着2020年以后，扶贫工作将从攻坚战转为持久战。应对相对贫困不能采用脱贫攻坚的形式，而要更多地聚焦在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上。应对相对贫困不再是“人海战”，也不再是“资金投入战”，而将更多地依托经济发展、税收、公共财政以及公平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实现全面小康还要补齐哪些短板和弱项？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周长城在《着力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报刊聚焦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2期聚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什么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CHINESE CADRES TRIBUNE
2020年第2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什么
全面小康目标实现后，我国脱贫攻坚的任务如何转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贫困治理进入新阶段》一文中认为，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我国贫困治理取得巨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面小康建成后，贫困问题仍将是发展的主要矛盾，但是贫困的特点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变化，以绝对贫困呈现的贫困特点将更多地以相对和多维度的特点来呈现。这意味着2020年以后，扶贫工作将从攻坚战转为持久战。应对相对贫困不能采用脱贫攻坚的形式，而要更多地聚焦在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上。应对相对贫困不再是“人海战”，也不再是“资金投入战”，而将更多地依托经济发展、税收、公共财政以及公平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社会的短板和弱项》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人民生活质量较大提高，但由于诸多原因，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未能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分配不均衡。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坚持“社会公平”理念，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终极目标，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调查，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潜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首先着力补齐医疗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短板，再逐步补齐劳动、住房、教育、社会救助、国防等领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弱项。

社会的短板和弱项》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人民生活质量较大提高，但由于诸多原因，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未能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分配不均衡。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坚持“社会公平”理念，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终极目标，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调查，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潜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首先着力补齐医疗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短板，再逐步补齐劳动、住房、教育、社会救助、国防等领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弱项。

题，他称之为“类型比较”。1982年以后，他把研究从村扩展到镇，在对吴江县10来个小城镇进行研究后，他开始不满足于吴江县的以点概面，进而扩大到苏南地区和江苏全省。通过对苏北、苏中、苏南的比较研究，实现由点到面的扩展。后来，他的调查又走向全国，根据“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的比较分析，达到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认识。这种类型比较法是他方法论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开辟了一条新的社会研究方法。第三，坚持追踪研究法。对于有代表性的地方，甚至是同一个人，抓住就不放，持续关注它的发展过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纵观费孝通的治学之路，一个小小的江村，他就反复访问了26次，特别是后面24次调查访问，是在他71至92岁高龄之间进行的。不仅江村，对其他调查费孝通也采取了追踪调查法。例如，在研究“边区开发”问题时，1982年至1995年，他先后10多次到内蒙古实地调查。

费孝通关于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许多研究，都极具前瞻性，走在了实践的前列，彰显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紧紧追赶时代的步伐，“志在富民”“从实求知”，一生钟爱调查研究，这些治学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做学问具有重要借鉴意义。